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田 彬

摘 要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关键词 王国维 陈寅恪 考据 二重证据法 史学

王国维与陈寅恪作为中国近代学贯古今中外的著名学者,两位先生无论是在身世上还是治史上都有太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位先生都出身于名门世家。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州海宁城,父亲王乃誉是商人,但很重视读书。所以在父亲的熏陶下,王国维自幼就博览群书。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晚清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曾任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名气比陈宝箴还大。家世的显赫对陈寅恪有很大的影响。而且陈寅恪自幼聪明勤奋,博览群书。其次两位先生都曾留洋海外,通晓多国语言,都极力介绍外国先进思想和理论的应用。两人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同为清朝乾嘉学派的继承人。王国维投身于昆明湖,陈寅恪终身不嗜功名,都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己任。另外王、陈都肯定中国传统的学术精神,同时积极吸取西方学术方法的长处,取长补短。治史上两人都重视史料的应用,主张兼采“异族之故书”。在文学修养上王、陈都造诣颇深,不分伯仲。本文仅从考据上对两位先生拙作比较。

首先在考据上,王、陈都主张精密、细致地进行研究,并积极主张西学东用。中国古代考据的最高峰是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等人引领的“乾嘉学派”,利用考据训诂的方法,乾嘉学者们在经史的校订疏解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在考据上讲究“无征不信”。王国维创立了“二重证据法”,主张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补正。陈寅恪推演“二重证据”,并提出要重视“新材料”。加之两位先生都留洋国外,主张中西学术方法相结合,王国维提出“能动化合”说,陈寅恪则充分继承和发展了文化史学的方法论观点。王国维曾留学日本,主攻哲学和文学,后在罗振玉的支持下,开阔视野转入历史学研究。由于幼时培养的良好功底,加上他对经学和文字小学的系统学习,初入历史学领域不久,先生就取得了不少成绩。“王国维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后,之所以能很快在某些方面崭露头角,除了其本人的天赋、勤奋和注重融会新的方法而取精用宏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善于跟踪国内外有关本学科的发展态势,并根据自身的条件正确选择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或突破口。”^[1]王氏在先秦史、敦煌学和简牍学上尤其成绩斐然。由于治过西方哲学,加之熟悉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王国维运用中西融会的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史学理论。即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对中国古文献学进行考证。利用这种方法,王氏写出了不少名文。比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他就写出了《宋刊〈水经注〉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明抄本〈水经注〉跋》《孙潜夫校〈水经注〉跋》等一系列文章。“所以在考释散氏盘铭等古器物、古地理和研究殷周秦汉历代古史,特别是他晚年在研究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国内外学术界起有深远的影响”^[2]。而陈氏被称为“教授之教授”,在史学上的造诣可以说是博大精深。陈先生精通藏文、蒙文、西夏文、希伯来文、印地文等

十几种文字语言,学问极其广泛,开拓领域很多,尤其在“不古不今之学”——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用力至勤。在考据方面如果说王国维继承的是乾嘉训诂考据,那么陈寅恪便是宋学的“光辉传人”。与朴学相比宋学治史讲究实事求是,即“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3]。陈氏博闻强记,应用材料时可谓是“信手拈来”,而在古史料的考证上又是极其严谨的。王氏提出“解释古书,其严谨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有习见之义,古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4]从考据功夫上,王国维讲究细致严谨,陈寅恪强调严谨之上更强调“准确”。以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陈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继承上和追根溯源上举着两杆不同的旗帜,最后又殊途同归。另外两位先生强调西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不谋而合。观堂先生以身殉道,但其之死还是众说纷纭。陈寅恪主张“殉节”,而非“殉清”或是“罗振玉逼债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文,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在观堂先生的碑铭中如是咏观堂,其实也是本人的真实写照。陈氏在国外留学十数年,不为功名,而求气节,这些经历可能使陈氏成为最了解王国维为何而死的人。正如后人评介说,“陈寅恪治史同样特别注重广搜史料……陈寅恪之重视史料和考辨、运用史料的方法明显地深具兰克学派精神”^[5]。王国维和陈寅恪乃至胡适的“拿证据来”、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可谓都是渊源相近的。

王氏在文献学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先生本人极其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论,最著名的是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云:“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印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证”可谓是对王氏“二重证据法”最准确的揭示。“二重证据法”其一是重证据“纸上之史料”,即已有之古典文献;其二是重证据“地下之材料”,即地下文献与文物等。这种考据方法在当今已经普遍应用了,而在20世纪初期(王国维在1925年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可谓是石破天惊,犹如给史界带来一股春风,有划时代之意义。当时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推崇,并应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如郭沫若应用“二重证据法”写出《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吴其昌写出《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等等。可见“二重证据法”反响之强烈。陈寅恪通过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加以诠释,并演绎“补正”到“互证”,从方法论上做进一步的完善,使“二重证据法”更加完整而科学。所以说王氏的“二重证据法”同样也适用于寅恪先生。“胡戟认为,陈氏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美结合的史学方法特点有三:一,考异求真;二,对复杂历史问题做动态把握;三,抓关键大事转折点。”^[6]陈氏另一个求新之处是重视新材料的使用。先生说:“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上掉下来,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

料加以新注意、新解释”这是十分有胆识的提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所以胡适称陈寅恪为“最能用材料的人”,许冠三称他“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的扩充”^[7]。

扩大史料范围上,两位先生各有贡献。可以说王氏的史学考察的主要贡献是“二重证据法”,而且他身体力行,几乎所有考察工作都是从大量的基础工作开始。每进行一项研究,他总是充分研磨基本史料,然后以求真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通过比较、分析或综合、归纳而推求出坚实的结论。历来的传统考据学的治史准则是“考信于六艺”,即古史的真伪要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来判定。而王国维开阔了视野,将传统经史以外一些“不雅驯”的文献材料和地下出土材料引入史学考察之中,利用这些材料来审查、验证传统经史的有关记载。这种方法极大地增加了史学考察的史料范围,所以说王氏取得的成就超越乾嘉诸老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陈氏在史学研究上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开创了“诗证史”的考据方法。“寅恪先生以诗证史,更是扩大了史料范围,开拓了新的区域”^[8]。此前人们对古代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多注重其艺术价值,鲜少注意史料价值。陈氏则认为这些文学作品中保存有大量的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于是他便创造性地将许多文学作品中的记述内容与历史记载综合起来进行考据、研究,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著名的《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就是通过诗文来考证历史的典范。

两位先生同是敦煌学的专家。陈氏是第一个提出“敦煌学”名称的人,并从理论上肯定了敦煌文献的价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东起到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9]。这是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所说,其语论述了敦煌学研究的意义,广为人知。通过对敦煌学佛经、文学、史学上的考据,陈氏作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文章,成绩斐然。陈氏主张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即“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10]。在寅恪先生的谆谆教诲之下,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开始关注并致力于敦煌学的研究。王氏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专家。他充分运用敦煌遗书遗文,对中古时期于阗、高昌、回鹘等地方政权之史事进行考据,并据以考校了许多古籍版本,对敦煌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这也是王先生“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印证”而取得的成果。

两位先生都治古代史,但在治史的重点上有所不同。王氏的

重点在殷周秦汉。观堂先生对传统的经学、史学、小学很有研究,所以他主要是以经史二部之书与甲骨、金石等地下材料相互释证。而陈寅恪先生的主攻方向是“不古不今之学”,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陈氏精通史学、文学、哲学、佛学,通晓近二十种中外古今文学,熟知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等写成的史学、文学、哲学、佛学等各方面的文献材料,甚至许多以古梵文及其他外文写成的文献材料也能运用自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曾说过,“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治经”,所以在考据时他不多征引经书。王氏是朴学的继承者,作书行文往往是无征不信,而陈氏便少了那么多的朴学味道,同时他大胆地主张从旧史料中发掘新意,所以陈氏常常有惊人之语,往往令人耳目一新。

总结之,对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继承,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借鉴,并利用细致、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考据史学的共同之处。由于不同的主观条件,二人的史学考察又各有特色。王氏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更注重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秉承宋学精神。所以说王氏是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而陈氏通过考据把握“义理”。一个“精深”,一个“通识”。另外,两位大师的人格精神也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胡逢祥.论民国初年王国维学术路向的转变及其方法论特征[A].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99.
- [2]吴泽,袁英光.王国维与《水经注》校勘[A].王国维学术论文集[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56.
- [3][8]王永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121.
- [4]罗志田.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A].近代中国史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80.
- [5]陈其泰.“民族——文化”观念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A].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Z].北京:2003.221.
- [6][7]何晓明.陈寅恪、郭沫若之于20世纪中国史学之意义[A].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2,233.
- [9][10]钱文忠.陈寅恪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202,209.

田 彬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樊 誉)

信息之窗

《沧桑》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知网”声明

《沧桑》自2000年第1期起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知网”免收作者版面费,并免费提供作者引文率统计资料。作者可通过所在单位设立的中国学术期刊文献检索咨询站免费查询检索本人在《光盘版》和“中国知网”(chso@chinajournal.net.cn)上发表文献的被引用情况;本单位未设中国期刊学术文献检索咨询站的作者,可直接向清华大学总站查询。凡本人文章不愿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知网”上刊载的作者,请在来稿上声明,我刊将做适当处理。

沧桑杂志社